“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仁重德”、“主和尚通”、“天人合一”等中华合理精神，是医治西方现代社会病态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当今世界充满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最好的精神医治方法。

——本书著者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明的现代应对与深长意味

中国的古典时代很早就已经过去了，清代乾康盛世开始闭关锁国就已在宣告中国古典文明的终结。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闭关锁国竟然是中国的传统宗法制（宗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冲突引起的。看似可笑，实质有其深刻的原因：基督教叫人们只拜上帝，不拜皇帝，不拜祖宗，那是传统中国人绝对接受不了的。于是，乾康盛世之年，坚决把基督教洋鬼子赶出国门。从这个历史事实中，使我们领略到了“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乃是文明冲突中最为深刻的冲突”的道理。

单纯的古典中国文明决不能拯救现代中国人。

但是，单纯的西方文明更不能拯救现代的中国人。

当然更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国人要想走出现代中国的困境，既不能离开中国古典文明，更离不开西方古典文明。人类必须从历史的过去、现实走向未来。

现代中国人面临着自我拯救的问题。如何救赎现代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的出路到底何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现代人类精神的中国参与

1. 校正现代化出路的视角

人类已经迈进 21 世纪了。毋庸置疑，中国古典文明属于世界上的古老文明，而且是人类各族文明中惟一仅存不曾中断延绵流长的最古老文明。但是，古老文明未必不能对现代做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古老中国的文明要想为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必须建立下述现代意识：

其一，面对现代全球化趋势，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回应，中国人不能仅仅被动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要有跟进、学习并参与全球化的建设意识，更要有凤凰涅槃、火中再生、积极主动应对现代化的创造精神。

其二，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充满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境遇，中国人要敢于并善于运用中国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的胆魄和智慧。

现代中国人必须剔除传统中国人“不敢为天下先”的传统精神，汲取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古希腊精神。

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迎头赶上全球化的前沿。单纯被动地一味学习，永远不能完成时代赋予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人是中国人的老师。但“我爱我

师，但我更爱真理”。现代的中国人应该为真善美而追求，敢于超越中国古代的和西方的“老师”。

其三，要想有超越西方文明的胆魄和智慧，现代中国人必须对中国古典文明精神进行一番扬弃、厘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要做两个工作，即剥离清理、剔除改造过时的封建的糟粕部分，总结提炼、创造开发适合人类精神的精华部分。

中国文明的精华部分，不仅属于中国人，更属于地球人即人类全体。

2．中华精神应融为人类精神

民族文明和人类文明关系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越是害怕失去自我的人，就越不愿意融入社会，就越是必然失去自我；越是不害怕失去自我，积极主动融入人类文明的人，就越是焕发自我的价值光彩；越是民族的而不是世界的民族文明，也就是越被淘汰的；相反，只有那些既是民族的而同时又是世界的强势民族文明，才是不会被淘汰的。因为后者已经融入人类文明之中，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战争与征服是古代社会的法则。对话与交流、和平与发展、互通有无与相互依赖，才是现代社会的法则。凡是违背现代法则的人们，不管有多强大，人数多么众多，也必将被历史所淘汰。无论是偏激的西方人的基督教精神，还是极端的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精神，无论是“9·11”事件，还是美国军事征服阿富汗和伊拉克，都不代表人类发展的未来。因为，爱走偏激和极端道路的人，是不成熟的“青年人”，绝不是成熟老道的“成年人”。因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绝不包括热爱和平的广大基督教人民和伊斯兰教人民），不是崇文而是尚武，但依靠尚武征服世界的古代社会已经成为历史。武力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解决人们信仰问题的最好方式，只有散发出其内在的无穷魅力，让人们自愿选择，才是宗教信仰的发展出路。

早在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过后，许多人对预想发生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诚惶诚恐。几十年过去后，人们预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于是人们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麻痹下，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了。

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就已经悄然发生：这场战争的主要形式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经济和文化上的，主要是资源利益的纷争，还有深层的信仰冲突；主要表现形式是（广义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核心问题是利益冲突，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包括宗教信仰利益）等等的冲突。苏东解体现象，科索沃问题，阿以冲突问题，印巴冲突问题，僧泰冲突问题，车臣问题，库尔德人问题，恐怖主义问题，“9·11”事件，阿富汗问题，美伊战争问题等等，这一幕幕的冲突，难道还少吗？这些冲突并没让 20 世纪至 21 世纪初的人类安宁。

其实，战争是人类关系处理的不文明形态，是人类发展的非常态，而和平才是人类关系处理的文明形态，才是人类发展的常态。不必害怕战争，重要的是用文明的方式化解战争。但是化解战争的主体，必须是强大的。

世界文明大战的斗争焦点是偏激的基督教分子和极端的伊斯兰教分子之间的信仰战争。他们的宗教主张尚武精神。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不择手段的，军事的、恐怖主义手段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把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极端者的“基穆冲突”。

现在看来，偏激的基督教者占有绝对优势，想要消灭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然而，想要消灭一个民族，一个强大的精神信仰族体，不仅不容易，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印巴冲突的警示还不够吗？巴基斯坦与印度相比，两者的强弱非常的明显。但是，印度就是无法消灭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人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民族利益支撑着。

在未来的极端者的“基穆冲突”中，中华民族精神将能够派上大用场。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精神才是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仁重德”、“崇文尚和”、“天人合一”等精神。这种精神正好成为极端者的基穆冲突的中间调停人。但是，调停人必须自身强大。中国强大到能够充当双方调停人的时代，不仅是中国人的幸事，更是人类的幸事。

不管怎样说，现代世界冲突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中国古典文明中借鉴良方。

古典中华民族的哲学精神不仅璀璨耀眼而且源远流长，不仅属于人类的过去，还属于人类的现在，更属于人类的未来。总之，中华民族精神应属于人类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类精神的发展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就是说，人类精神的发展不单纯是真善美的单向度正价值的发展，也包括了假恶丑负价值的交织。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华民族精神在其源远流长的发展中，隐含了异常丰富的具有正价值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挖掘的。

中华民族的古典精神在于崇文而不是尚武，其中包含的诸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仁重德”、“主和尚通”、“天人合一”等等合理的民族精神部分，应该融进人类精神之中。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既是民族的更是人类的，尤其是现时代的。因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合理成分“是医治现代社会病态、促进文明向更高阶段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21 世纪的人类如果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必须向孔子和儒学吸取智慧。时代需要儒学，它为儒学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舞台；儒学需要创新，只有创新的儒学才能走近现实生活，推动社会前进。”①

中华民族精神精华一旦融为人类精神，那将是人类的幸事。在全球化中，人类充满了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最好的精神医

① 牟钟鉴：《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自序》，齐鲁书社，20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治方法就是中华民族的上述精神。

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中需要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华民族的古典精神在于崇文而不是尚武，其中包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仁重德”、“主和尚通”、“天人合一”等合理精神，是“医治现代社会病态、促进文明向更高阶段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是当今世界充满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最好的精神医治方法。

吸取中国古典文明的精华和西方文明的精华，组建现代中国文明，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创造性地开发中国现代文明将有两重意义：不仅可以救赎中国人，还可以救赎人类。救赎中国人是我们的直接目的，救赎人类是我们的间接目的，而且是最终目的。只想救赎自己放弃救赎全人类，最终根本不能拯救自己。我们不可能在四面楚歌中拯救自我。救赎全人类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

中国人只有率先主动迎上全球化，才能为全球化做出巨大贡献。21世纪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等社会危机。在解决人类危机中，需要中华民族精神。

3. 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发展进路

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进路并不相同。

西方文明的发展进路是：西方始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发展于自然本体论，从宇宙观开始发展，所以一开始科学理性、哲学逻辑理性就很发达。因此，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率先发达起来。古希腊哲学创建了异彩纷呈的丰富世界，包括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观、人生观

和历史观等。

自从柏拉图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之后，西方文化中注入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因此高度发展了天人对立、人际对立、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于是，个性、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精神也就高度发达起来。

但古希腊文明仅仅是全世界乃至西方世界的星星火种。中世纪从神学的角度发展了本体论。经过文艺复兴，古希腊星星火种，蔚然燎原，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精神逐渐扩展为全球精神。但是，基督教精神并没有成为全球精神。

总之，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主要是世界关怀或宇宙关怀，而不是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关怀的重心放在强调二元对立、斗争和征服。

所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异常发达；

竞争意识、社会责任感十分强烈；

“不自由，毋宁死”成为西方人的名言。

因此，个性自由成为西方哲学的最高定律。

中国古典文明走的是相反的另外一条进路：中国古典文明的终极关怀是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而不是世界关怀或宇宙关怀。关怀的重心放在强调天人合一、一元化、和谐和人伦道德。因此，宗法制盛行。

中国古典文明（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开始于《周易》。《周易》的哲学观是阴阳合一的世界观。后来儒家和道家各执一端，“儒家崇阳，道家尚阴。”[①] 无论是《周易》，还是儒家和道家，思想领域的人生观、伦理观和直观理性异常发达，政治领域的专制主义异常完善，科学（理性）、逻辑（理性）非常薄弱，法治（理性）非常缺失。

所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异常发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① 牟钟鉴：《儒学价值的新探索》，第 226 页，齐鲁书社，2001。

异常缺乏。

所以竞争意识、社会责任感（不是家族责任感）十分薄弱。由于宗法制盛行，家庭责任感强烈。由于古老中国是缺乏竞争精神的社会，所以是“死水一潭”的社会。现代中国引进竞争机制，因此充满了活力。

所以“不敢为天下先”成为古老中国社会的第一戒条。

所以，“活着比什么都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为中国人的名言。

因此，“安身立命”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定律。

中西方文明的发展根本进路的不同是：

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走的是世界关怀或宇宙关怀之路，关怀的重心放在强调二元对立、斗争和征服的精神部分。个性自由成为西方哲学的最高定律

中国古典文明的终极关怀走的是社会关怀、人文关怀之路，关怀的重心放在强调天人合一、一元化、和谐、人伦、道德的精神部分。“安身立命”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定律

中西方文明发展进路的不同，正好互补，而不是择一废一。正如人的大脑的两半球，不能说哪个更重要。

现代中国人要想走出现代人的困惑，一方面需要面向世界，吸取国外的文明精华；另一方面，必须对中国传统古典精神的精华进行提炼。

二、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何在

在这场现代中国人追赶现代人类文明前沿的过程中，需要总结和提炼传统中国文明的精华部分。

本书在此，仅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分析入手，并且郑重声明：本书的提炼未必是准确的，一定是不全面的，肯定是需要完善的。

重要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

1. 阴阳世界观与人生意义世界的启迪

中国最古老的有文字可考的典籍是《周易》等《五经》。

中国古典哲学的曙光展现于远古的《周易》、《尚书》。其最大的哲学贡献，就是阴阳世界观与人生意义世界的启迪。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

如果把《周易》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曙光，那么《周易》中所包含的哲学精华成为中国古典哲学曙光阶段的主题。《周易》的最大哲学价值在于阴阳世界观的建立和人生意义世界的领悟。

其一，阴阳世界观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具有深刻的代表性。

《周易》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总根源，就在于领悟出万物生生变化的总根源：世界万物无非两种基因，一为阴性，一为阳性。阴为地，阳为天，天地相交，阴阳相感，始生八卦，进而生成六十四卦，而后化生万物。

后来中国哲学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①，后来的河图、洛书及太极图，阴阳五行，武术气功，中医理论，凡此种种的领悟不能不说始于《周易》。

其二，人生意义的研发是《周易》的主题。

古老中国人早在《周易》就开始了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究。《周易》哲理，不像古希腊哲学，把世界的意义理解为自然的本原，而把意义归结到人生进路的辩证关系上面。《周易》不把哲学重心放在追问世界本原物，而在人世间的命运，在于追问人生的吉凶祸福上面。

① 《易经·谦·系辞上》。

《周易》告诫人们，人身处逆境并不代表与吉福无缘；人在得意之时，也不表示与祸凶无缘。

《周易》为成功人生开出的最好“药方”是恒其志，恒其德。

人生意义的研发，不仅成为孔子“生勤勉、死静息”、“内自省”等思想的理论根源，也成为荀子“锲而不舍”的精神源泉，更是孟子养“浩然正气”、育“大丈夫”之神的基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正是以这种坚韧不拔、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概，自勉自励，教育世人的。

其三，哲学的真谛在于“得意忘言”或“得意忘形”。

哲学所要领悟的目标是世界的统一性，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绝对”，不是“相对”。而“绝对”层面的东西是不能用有限的语言或有限的形体所能表达的。要想领悟哲学真谛，必须“得意忘言”或“得意忘形”。

此外，从“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到“君为轻，民为贵”，乃是中国早期哲学的一个重点。

《尚书》认为，王天下者必须以德配天，才能得皇天之眷佑，保万世太平。《尚书》非常重视为政之人的德性修养，强调以德修身，以德治民，强调礼度，反对纵欲。

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看到了君天下者离民离德的严重后果，主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一切从君王自己做起，用贤人之风，带动恶人之草，使之弃恶从善，主张以民为鉴，普民以惠，这些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孔子的教育学及“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论语》被西方人称为中国人的“圣经”。

孔子《论语》的精华只有一个“仁”字。仁的内涵异常丰富，但总的精神是爱人。仁的具体内容是“忠恕”，仁的具体表现是“克己复礼”，行“中庸”之道。

仁的最高境界即为“成人”。而达到成人的惟一途径就是学而不止，自强不息，死而后已。可以说，孔子思想从头到尾都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

无论是从个体人生还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上讲，《论语》都有其巨大的贡献。其“忠恕”观是一个极好的“药方”。所谓忠，即矢志不改，至死不移。所谓恕，从消极的方面讲，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从积极意义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关系原则，在阶级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成为各阶级之间的行为准则，至多只起到了调解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

这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准则，虽然不是诊治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但比起西方霍布斯“人对人之间是狼”那样赤裸裸的兽性欺诈、吞食与金钱关系，有着更多人情味。它体现了人类社会不同于兽性社会的特殊文明形态，有着超现实的历史意义。

孔子的“中庸之道”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

孔子把“中道”、“中行”作为理想的道德品质和人格，这与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很有相近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卑不亢是虚荣和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亚里士多德还鲜明地指出：“适中是人的美德”。这与孔子的“中道”、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雍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庸”、“中行”相似，都强调不要过与不及，要走中间路线。

相比之下，孔子的思想要比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深刻得多。他进一步提出了把“中道”作为道德行为准则和道德理想人格的思想，并看到了折衷过程中的“和而不同”。

孔子《论语》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即其教育学的思想。

孔子留下许多教育学的名言。孔子把教育学习追求的境界提升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学习的目的不是为做官、扬名，而是为守善道、致仁义。孔子把教学视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过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学习和理论实践当成一种快事，这充分体现了他以“学而不止”、“学以致用”为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的伟大境界。

孔子把学习和受教育提到人生第一需要的高度。孔子告诫人们说，虽然仁、知、信、直、勇、刚是六种非常好的品德，但如果不好学问，不知如何适度践行它们，就会在道德实践中陷入愚蠢、放荡无羁、被人利用、尖刻伤人、捣乱闯祸和胆大妄为等坏的境地之中，更不可能成为圣人。

孔子研发了学思相辅的深刻辩证关系。所以有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言。学而不用，学而不思，流于空谈和肤浅。只有勤于思考，学为所用，才能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思想、有价值的人才。

“生勤勉，死静息”的生死观是孔子给人类的又一贡献。对于人生，既不厌烦以求速死，又不沉浸其中而及时行乐。孔子认为，生之自然，死亦自然，人生在世，应“既来之，则安之”，持一种乐而不淫、悲而不哀的泰然态度。要正视现世，不指望来世，也不滥用今生。孔子建议，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和气概，要永进不止，直至死而后已。孔子这种人生态度，继承了《尚书》“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思想，鼓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中华民族正是以这种“生勤勉，死静息”的现实人生态度创造了中华古老的文明。

孔子的“远神论”是深刻的和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死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从而成为宗教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关鬼神及生死问题，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未知生，焉知死？”；一句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对于鬼神，他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只是把问题悬置一边。有的学者把这种鬼神论概括为“远神论”。“作为汉文化主体的士家学说，虽然对各种神秘主义文化现象采取高度理性化的立场，但其本质上并不是无神论，而是远神论。[①] 这种概括是非常准确的。

古往今来，宗教神话种类繁多，但惟有孔子的儒学才是一种明智的远神论。

其实，生死问题和鬼神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孔子给人类开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良方，那就是远神论。

3.《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战国时代的《易传》，博大精深，从天到地，从自然到人，从微观到宏观，从日常到国家治理，无一不在其囊括之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出了《易传》的精华。

《易传》教导人们，应以天地为师，效法天地自然，既不断创造，自强不息；又敦厚德行，以厚德育人。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天地的根本道理，而且是人生的根本道理：天道刚强，始创万物；地道厚载，滋养万物生

①张践：《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第 181 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长。人类应以天地为师，效法天地自然，既不断创造，自强不息；又敦厚德行，以厚德育人。

《易传》启迪人们要“自强不息”，告诫人们要犹如天象一样刚强、速捷，不断升华自我，还要像大地一样谦虚、谨慎，要厚如深渊，深不见底；要宽如大山，能包容一切。人的强大在于人的宽厚、坚实。

4. 柔弱胜刚强的达观智慧与忘我逍遥的人生境界

与儒家积极入世、自强进取的精神相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提出了一套独具特色、不求名利、不参与政治、一心求全保真的达观智慧。这种智慧看似出世、远离社会，实则入世，以无为达无不为。

从民族精神，或从地域文明的角度，即从中国北方南方文明原生发展状态来看，儒家文明代表着古典中国的北方文明，而老庄哲学则是古典中国南方智慧的象征。儒家重“阳刚”，老庄重“阴柔”。

儒家与道家是中国传统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大脑的“两半球”。

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不能很好地解读或释读中国古典文明的密码。

中国传统宗教是宗法制宗教，是尊贵“阳刚”的文化。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中轴的不是道家文明，而是儒家文明。其关键在于，是否有中国传统宗法制宗教的底盘支持。

然而，儒家文化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精神信仰的需求，所以道家文化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价值。

老子之所以强调“柔弱胜刚强”的方面，就是因为看到了，凡柔弱的皆为活生生之体；凡已死的，其体都呈坚强之状，故坚强与死相通，柔弱是有生命力的象征。其深刻哲理在于，柔弱具有强大的耐力和韧劲，可以承担比自己重许多倍的压力，可以被超越自己力量的东西揉以成屈，而内部结构仍会保持原状。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其“柔弱胜刚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表面上强调无为不争，目的却并不是真的无为，而是为了更大更广地有所作为。因此，老子并不主张出世，而主张更深入、更广泛地入世。

庄子的思想秉承于老子，又异于老子，是对老子的发展。与老子不同的是，他把运动绝对化，这就导致了他不仅否定静止、而且否定事物差异的相对主义理论，并进而创立万物齐一的理论。

庄子提出“逍遥”忘我的理想境界，目的在于解脱人生痛苦和烦恼。达到逍遥境界的办法是用豁达、宽宏的态度对待人生，不受外物牵累、清淡寡欲、安时处顺、自然无为，不把名利生死看在眼里，才可达到古之真人境界。

逍遥游是庄子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自由境界。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必须首先消除人生的烦恼痛苦。消除痛苦烦恼的最好办法是无待（顺从自然本性，驾驭自然力量翱翔于无限的绝对自由）、无己、无功和无名。真正做到这一切的是大宗师。大宗师的特性包括：首先要“忘怀于物”，把超脱名利物外，作为体认天道的首要收获。次之必须要“无为自然”，摆脱嗜欲纵情。再次之要把人生看轻，达到“死像休息一样平常”的境界，甚至提出“死为至乐”的主张。

中西哲学家为解除人生苦恼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佛教叫人排除各种欲望，进入涅槃境界。

道家叫人无为而治，达到清静无为，羽化成仙。

庄子叫人进行“心斋坐忘”的修身养性功夫，达到“任我逍遥，任我游”的境界。

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启发人“向死而在”，在可能性的全面开发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5.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张载的“四为”精神

儒家为真正的男子立下了如此的宏图大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国的千古名言，并成为千百年来男子汉大丈夫的安身立命之本。

北宋大儒张载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和文人“四为”精神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

修身养性是一般人成为君子圣人的惟一途径。而修身养性的过程,张载称之为“穷神知化”“穷理尽性”。

穷神知化是指人努力通晓“天神”奥秘，以达天人合一之境。而要穷神的变化，只有“崇德”。“穷神知化”的根本在于，扩充本心，忘却自我，使自己的行为意志，完全符合天理的要求。

“穷理尽性”是以万事万物为媒介，逐步达到对“天理”的觉悟和体验。穷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穷理的手段是学习。

张载的四为精神似乎是中国的仁人志士追求的最高境界：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其大意是想为天地立下准则，为老百姓立下做人的根本，为古今的圣贤继承可能失传的学问，为千秋万世开创太平的局面。

当然，在儒家学者心目中，这四为精神是有封建糟粕的。在这里，天地之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人之根本是孝道礼教，圣人之绝学是礼学理学心学，开发社会的万世太平纯属梦呓。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由此否定了张载的四为精神的精华。

由于现代精神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与人权。所以张载的四为精神可扩展为：

为全球人权立命；

为公民平等立法；

为中外往圣继绝学；

为各国民族开太平！

6. 存天理、流行化育与“知行合一”的认识精华

朱熹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代表，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朱熹思想实际上成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礼教的有力工具。

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完成了一场中国式的“哥白尼革命”。朱熹之前的中国哲学家侧重从社会人生的领域，阐释世界的“天理”，这不免有“坐井观天”之嫌。朱熹则将其放大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与宇宙。朱熹把人们从“井底”导引出来。

朱熹不仅用理气关系论证了万物产生的根源，而且用天道流行的理论论证了万物产生的过程：天地之间作为形而下之器的万物，都是形而上的天理流行、运动、造化、发育的结果。

王夫之提出了以行为基础的知行合一思想。

中西方哲学不仅在本体论上有分别，而且在认识论上也有根本的分野。作为古典中国哲学认识论集大成的王夫之认为，不仅行可兼知，而且“行”还是检验“知”的标准。因此，王夫之提出“知”的目的在于实践的观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